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方和平:瓦埠湖畔的抗日游击大队长

本报记者 廖凌云

方和平,原名方运怡,1905年出生于寿县瓦埠镇。幼年在瓦埠小学读书,后到吴山博爱学校求学。192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吸引了方和平,于是他投学于武汉军事学校研习骑兵,大革命失败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由于大革命的教育和影响,方和平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3月,方和平参加瓦埠暴动,暴动群众骨干编为皖北红军游击队,方和平任大队长。瓦埠暴动失败后,方和平被中共皖北中心县委派往阜阳担任中心县委的联络工作。1932年,方和平先后担任中心县委委员、中心县委巡视员、阜阳交通站长等职。在此期间,他变卖田产筹备党的活动经费。方家原有两条大船,也用作水上交通联络工作。1934年秋天后,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严重。方和平没有悲观失望,转至淮南田家庵开设了“咸丰斗行”,经营粮食生意,兼接待照顾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和过往的同志,“咸丰斗行”实际上成了党组织被破坏以后的联络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方和平积极参加了抗日工作。1938年春,他曾和仇西华、曹练白、曹伦等一起组织“醒狮”话剧团,在瓦埠湖两岸的石集、保义、三觉、瓦埠、小甸、上奠、杨庙等集镇演出话剧,演唱抗日歌曲,动员群众起来斗争。他还利用自己在瓦埠暴动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被编为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三大队,方和平任大队长。方和平率领的第三大队是以我党领导的原皖北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群众关系好,干部多为共产党员。

1939年秋,寿县在原安徽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方和平游击队。游击队初成立时仅有100余人,但武器装备很好,任务是扩大武装、发动群众抗日、阻挠日军扰民。当时寿县城、下塘集等地皆沦陷,强匪蜂起,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苦难深渊。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到1939年底,游击队发展到300多人,方和平任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游击队活动在淮南铁路两侧杨庙、朱巷、下塘集一带。

1940年3月,国民党皖东北行署主任颜仁毅的第8纵队,在向新四军淮南路东根据地进攻中失败而归,其中一个编队正向淮南路西逃窜。方和平获此消息,埋伏于必经要道——张店,包围编队,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

随后,方和平大队奉命调回到淮南路东和其他几个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2师新8团,方和平任该团3营营长,率部活动在淮南线两侧。1940年10月,方和平率部随团转移到定远的永康镇、靠山集一带。皖南事变后,方和平所在团又奉命改为新四军2师18团。方和平任副参谋长。

1941年夏,当时的环境异常艰苦,淮南铁路沿线日伪碉堡林立,附近的顽军也不断来骚扰。为了使部队能在淮南路西站稳脚跟、打开局面,18团派方和平率部到淮西配合行动,加强统战工作。

同年9月23日,方和平到今长丰县王集乡的东王家岗,召开各阶层人士大会,到会的有二三百人。方和平在大会上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对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因为方和平在这一带威信很高,加之他身材魁梧举止大

方,说话颇具感召力。他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以高亢的热情号召大家:“乡亲父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责任保卫自己的家乡,只要我们共同对敌,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台下群情激奋,掌声经久不息。会议开了一个下午,当天晚上部队转移到王集乡西北的北王岗村住下。

因白天在王集开会的声势很大,当夜,日军获此消息,出动了百余名日军和三百余名伪军包围了北王岗村。当哨兵发现敌人的时候已经晚了,一部分敌人已经冲进了村子,枪声与炮声响成一片。方和平一面沉着地指挥部队反击,一面安排撤退,趁天还没有大亮突出了重围,撤到了村外。正在这时,村子里传出了敌人的马嘶声。方和平的战马原是缴获日寇的东洋马,这马听到了同类的鸣叫,便拼命地挣脱了马夫手中的牵绳向村里狂奔而去。“千万不能让缴获日寇的战马再落入敌人手中,战马上有文件。”方和平见状立即又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冲入敌群,左右拼杀,奋力夺取战马,正在这时,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哒哒哒……”,子弹击中了方和平的胸部,他身子摇晃了几下,从马背上跌落下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深的告慰。在寿县瓦埠镇的方和平烈士故居,常有群众来到这里,缅怀先烈,为其胸怀满腔热血,血战抗日沙场的英雄事迹所感染。人们在致敬英雄中传承红色基因,在重温历史中感悟英烈精神,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红色基因在跨越时空的追思与告慰中薪火相传、赓续不辍。

以“淮楚文化”为钥
开启淮南文旅融合新篇章

尚家起

近年来,我市凭借武王墩考古发掘、《六姊妹》影视热播等热点事件频频“出圈”,淮楚文化资源的价值被重新审视。从“工业煤城”到“文化名城”的实践中,我市正以“淮楚文化”为学术支点,加速文旅融合实施新路径,为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去年的4月16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武王墩”重要进展工作会议在我市召开,并首次发布武王墩一号墓阶段性重磅发掘成果,淮南文旅由此广泛进入大众视野。这座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上万件文物,不仅为研究楚国晚期历史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更让淮南作为“楚国最后的王都”地位得到学术确认。

以此为契机,我市提出构建“淮楚文化”学科和文化品牌理念,与“荆楚文化”形成差异化互补,填补了安徽楚文化研究的空白。通过成立楚文化研究院、举办学术论坛、出版专题著作等举措,我市正将考古发现转化为系统的文化品牌,为文旅产业注入深厚的学术内涵。

同时,面对旅游资源“小而散”的短板,我市以“大项目”为抓手,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串联武王墩、寿县古城、八公山等旅游资源,构建全域旅游格局。例如社会高度关注、全市热切期盼的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于3月26日正式迈出重要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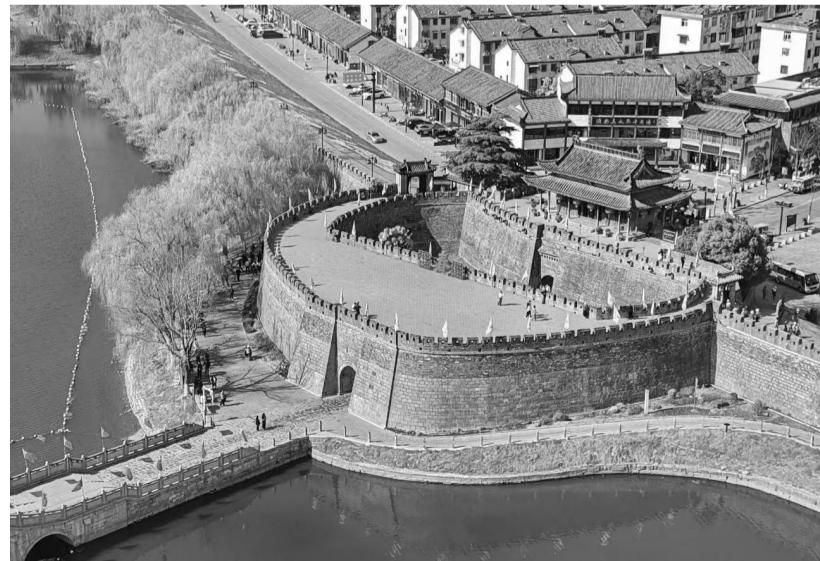
淮南武王墩墓展示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开工,预计项目建成后,年接待游客量将突破100万人次;比如寿州古城的升级,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二十四节气馆等成为热门打卡地;又比如八公山区依托“淮南虫”、《淮南子》、淝水之战古战场等文化IP提档升级八公山旅游景区。这些项目通过“一体规划、品牌共建”实现资源聚合,形成“15分钟—1小时”旅游圈,不仅展现出淮楚文化的厚度,更着力破解以往“碎片化”发展的困境。

尽管势头强劲,可仍需看到,我市文化资源利用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龙头项目,文创产品开发深度不足,沉浸式体验稀缺,许多资源仍“养在深闺”等问题依旧存在。未来,需进一步借助数字技术、跨区域协作等方式,推动文化资源向产业优势转化。

淮南的实践表明,文旅融合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抓手,更是一座城市对自身历史的重新发现。当学术研究与大众体验深度交织,“淮楚文化”便成为淮南发展的新密码——它既回答了“何以中国”的历史命题,也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淮南方案”。



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现场



寿县古城 (资料图片)